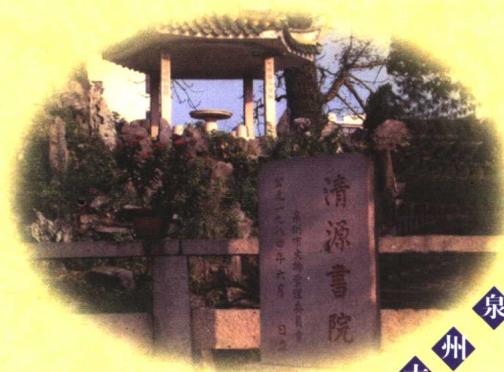


泉州古代书院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院 书 代 古 泉
清源书院



◆ 齐鲁书社

99.57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泉州古代书院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古代书院 / 陈笃彬，苏黎明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3.8

ISBN 7-5333-1203-1

I . 泉... II . ①陈... ②苏... III . 书院—简介—
泉州市—古代 IV . G649.29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491 号

泉州古代书院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E - 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203—1/K·348

定价：26.00 元

**本书由振兴中华教育科学
基金会和泉州师院资助出版**

泉州古代书院序

刘海峰

书院是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文化遗存。作为制度形态的书院，已经随传统社会永远消逝，离我们越来越远；作为建筑形态的书院，则在东亚世界还有广泛的存在，不少地方都还能见到一些书院旧址。在福建泉州，也有一些书院遗址保存下来，虽然不多，但却可看出古代泉州是书院繁盛之地。

历史上的泉州辖域广大，包括了今天泉州市各区县和厦门、同安、金门等县市，是朱熹过化之地和英才辈出之乡。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修书院和集贤书院。当时的集贤书院已有教学活动，但真正作为后世书院起源的书院，则始于唐后期兴起的私人读书。中唐以后，有许多准备报考进士科的士子隐居山林，潜心读书。在唐代举子读书山林风尚中，泉州的欧阳詹隐居读书也是典型事例之一。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考中进士的晋江人欧阳詹，就曾隐居晋江的山寺读书备考。同年与欧阳詹一同考中“龙虎榜”进士的有韩愈等著名人士，欧阳詹成为唐代福建最出名的人士。南宋时朱熹考上进士后，起家官为同安县主簿，兼管同安（包括今厦门、金门）的教育事务。他先后在泉州不少地方讲学，对泉州书院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欧阳詹和朱熹成为明清时期泉州许多书院的主要祭祀人物。作为儒家文明的产物，书院又是理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泉州的书院积极传播和维护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朱子学（闽学），是福建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宋明时期泉州科甲鼎盛，也

与泉州书院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个重要方面，有关科举和书院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以至于逐渐形成了“科举学”和“书院学”。不过，以往的书院研究较集中于全国书院的总体研究，区域性或地方性的书院研究也有，但有关福建书院研究的专著还是空白。历史上福建也是书院较多且影响较大的省份之一，很值得加以发掘整理。现在，陈笃彬院长、苏黎明教授合作写出一大本《泉州古代书院》，确实难能可贵。作者充分利用泉州各种地方志中有关书院的记载，以及南安《诗山书院志》等宝贵资料，论述泉州书院的起源，并对宋、元、明、清各代泉州书院的发展进行了考述。该书还对泉州书院的组织制度与教学活动、泉州书院的影响与启示等作了概括性的研究，对书院与科举的关系也有较多的辨析。

地方志的记载往往互有矛盾，如不详细考证，就很可能出现误解。例如，我在《福建教育史》一书古代部分的论述，基本上都直接依据《八闽通志》等史书的原始资料，偶尔在元代福建新建书院一览表中引用了他人的记述，但恰恰就在此出了问题。《泉州古代书院》认为元代同安并没有创建一所文公书院，新建的大同书院就是南宋时的文公书院。这一辨析是有道理的。一斑全豹，可见《泉州古代书院》的研究相当深入细致。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定会推动福建教育史和文化史的深入，也会促使福建其他地区书院史和科举史研究的进展。

泉州是一个物阜民丰、人文荟萃的奥区，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滨海之乡。该地民风具有尚勇孔武的特性和面向海洋的开拓性，因此清代以后移居台湾和南洋的民众特别多；同时，泉州民风也有文质彬彬、向慕教育的一面，这在近代以来特别盛行捐资助学的风气中显露无遗。《泉州古代书院》一书，为我们

了解该地向学重文的传统提供了十分具体和生动的例证，也为当今发展泉州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历史参考。作为教育史研究者和祖籍泉州（泉港区峰尾镇）的乡人，阅读《泉州古代书院》甚感亲切。祈愿乡邦教育发达，人文聿兴。是为序。

2003年4月29日

引言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介于私学和官学之间的一种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殊的教育机构。从唐代至清末，书院存在了一千多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书院在政治上和教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国封建时期的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书院起源于唐代，而书院制度的确立则是在宋代。书院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入宋以后出现的理学、心学等儒学学派的学术活动紧密相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情势下，书院时兴时衰，它的性质与功能屡经变化，社会意义并不是先后完全一致，发展路向亦不尽相同。但一般地说，书院在教育上是中国封建社会自唐代以来的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是继先秦私学、两汉太学、一般的精舍之后的又一种特殊的私学组织，也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其目的在于自由研究学问，讲求身心修养，是理学家或学者的讲学之所。因此，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书院在组织管理形式和教育教学制度、方法等方面，形成了自己不同于官立的太学与府、州、县学的特有管理模式和教学方法，具有许多独特之处，对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开创一代学风，丰富发展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积累和创造教学经验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教育遗产，不能忽视对古代书院制度的研究。

古代泉州是福建乃至全国书院制度颇为兴盛的一个地区，

尽管同全国一些书院制度发达的地区相比较，泉州书院制度的诞生在时间上稍为落后，但是当它出现于泉州大地之后，却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发展规模展现于世人面前。古代泉州的书院起源于唐末五代初，初盛于南宋，明清时期达至高潮，历经周折，几度兴衰。自唐末至清末，泉州历代共建有书院七十三所，其中唐代三所，宋代十一所，元代二所，明代二十所，清代三十七所。从地域上看，分布于晋江县（含府治）十八所，南安县十三所，惠安县六所，安溪县七所，永春县七所，德化县九所，同安县十所，金门县三所。历代有废有修，至清末仍有相当一些书院存在。清末废科举后，书院才告消失，或停办或改办为新式学堂。

泉州历史上的书院，相当部分是由地方官倡办的，称公办书院，规模一般较大；也有不少是由地方儒绅创办的，属民办书院，规模有大有小。书院是名儒贤士讲学授徒之所，一般具有奉祀先儒、收藏书籍、教授生徒、学术交流与著述等职能，学术研究风气较浓，明清以前与科举关系不大。进书院学习的生徒，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主要在于进一步加深学术理论的研究和切磋活动。古代泉州书院的组织制度代有不同，同一朝代的不同书院，其组织制度也有较大差异。但一般而言，书院继承了古代私学的传统和特色，同时也汲取了佛教寺庙讲经说法和官办学堂的一些长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在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上，书院注重学术理论切磋，虽讲授儒家经典，以“四书”、“五经”、史传为主，但往往能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而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常常成为兴起某种学术思潮、学派及学者的讲学基地。在教育方法上，它具有注重自学，提倡自由论证，问难论辩，会友讲习，相互切磋，教学相长等特点。清代书院虽然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场所，但在教学上依然比府县学自由，注重生徒自学与教师辅导相结合，有时还聘请名儒来院

讲学，也有某些地方官亲临授课。在管理制度上，书院往往聘请学有所成的名师主持院务，同时，一般还设置了专门管理院务的各种职事，但基本特点是机构简单，管理人员不多。学生则常常是择师而从，来去自由。书院虽无固定学制，但有学规学约，订立了规定教学内容、步骤、方法的学规，引导生徒信守。在机构功能上，除了重视讲学读书，还建置了包括藏书、祭祀、刻书出版等多种功能的机构。因此，书院一方面继承、发扬了汉唐私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可以说，区别于汉唐教育模式的书院，是古代私学在新的文化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具有多功能的、制度化的私学。正因为如此，它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泉州地区与官学平行发展的一种主要教育组织，而论其在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方面的历史功绩，则远远超过官学。书院制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教育由上层贵族垄断向 下层社会的移动，促使士大夫文化向平民文化过渡，使传统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固然，由于书院的基本宗旨和历代封建统治者大一统学术的主旨不甚协调，故封建统治集团对待学派性书院的方针是，或使其官学化，或限制禁止，或改造利用，这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书院的路向，削弱了其原来意义上的功能。但是，书院制度的长期存在，对泉州古代教育的发展，对泉州文化的积淀，以及对泉州古代整个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泉州古代书院，了解其办院特点，揭示其运行规律，从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对于今天我们如何办教育，如何推动泉州的教育事业得以更加迅速健康的发展，不无积极的意义。这也正是撰写此书的基本动因。



陈笃彬，男，
1951年生，福建泉州
人。1982年毕业于华
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为泉州师范学院
院长。



苏黎明，男，
1957年生，福建南安
人。1982年毕业于福
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现为泉州师范学院
教授。

目 录

《泉州古代书院》序.....	刘海峰 (1)
引 言.....	(1)
一、泉州书院的起源.....	(1)
社会经济的发展.....	(2)
官方的积极倡学.....	(8)
私学的日趨发达.....	(14)
佛教禅林的影响.....	(23)
二、宋代泉州的书院.....	(32)
宋代泉州书院初盛背景.....	(32)
宋代泉州书院的兴盛.....	(48)
宋代泉州书院的特点.....	(68)
三、元代泉州的书院.....	(73)
元代泉州的书院政策.....	(73)
元代泉州书院由兴而衰.....	(79)
元代泉州书院的特点.....	(86)
四、明代泉州的书院.....	(94)
明代泉州书院由衰而兴.....	(94)
明代泉州新建书院热潮.....	(103)
明代泉州续修的书院.....	(119)
明末泉州书院的毁废.....	(129)

明代泉州书院的特点	(137)
五、清代泉州的书院	(150)
清代泉州的书院政策	(150)
清代泉州新建的书院	(158)
清代泉州续修的书院	(183)
清末泉州改书院为学堂	(193)
清代泉州书院的特点	(199)
六、泉州书院的组织管理体制	(213)
泉州书院的组织形式	(213)
泉州书院的管理制度	(218)
泉州书院的经费收支	(222)
泉州书院的祠祀活动	(233)
泉州书院的建筑规制	(240)
七、泉州书院的教学活动	(251)
泉州书院的课程设置	(251)
泉州书院的教学特点	(257)
泉州书院的考课方式	(272)
泉州书院的学规学约	(280)
八、泉州书院的影响与启示	(289)
泉州书院的社会影响	(289)
泉州书院的历史启示	(305)
后记	(318)
参考书目	(321)

泉州书院的起源

古代泉州书院的初盛时期是在宋代，一向以文教落后著称的泉州在此时教育迅速发展，陆续创办了多所书院，书院制度亦随之逐步形成。但是泉州书院的初盛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有一个逐步萌芽和创始的过程，这一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五代。泉州的书院肇始于唐末。唐末至五代，泉州地区即出现了几所书院，如唐昭宗景福年间南安石井的杨林书院，以及晋江的集贤书院、张九宗书院等。这些书院虽然严格地说都还不属于书院，而只是读书人自己的书舍或收藏经籍之所，与宋代那种授徒讲学的书院有本质上的差别，因而尚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书院。但是，它们同宋代的书院又有无法割断的渊源关系。正是在唐代书院的基础上，逐渐衍化出宋代的书院制度。如杨林书院，唐末诞生时不过是杨肃的书舍，而到了宋代则发展为一所授徒讲学的书院，具有书院性质。因此，要分析宋代泉州书院制度形成的原因、状况和特点，首先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宋代以前的书院状况，探讨泉州书院的渊源。

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济是基础。任何形式的教育组织都建立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同时为这一经济基础服务，书院亦不例外。书院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经济为基础，离开了这一基础，书院的存在与发展就无从谈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说书院直接起源于私学，是私学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那么，这无疑同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私学的发展本身离不开经济的进步。唐五代泉州经济的不断发展既向私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又为私学的发展累积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两者的交互作用构成了这一时期私学迅速发展的坚实基础，从而也构成了书院形成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泉州的社会经济经过汉末以来的长期开发，到了六朝时代已有一定的规模。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发，而泉州僻在东南，较为安靖，没有大的战乱。由于社会长期的安定，人口及劳动力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生产技术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起来。进入唐代以后，泉州社会仍相对比较稳定，经济继续发展。唐朝“安史之乱”后，呈现出经济重心南移步伐加快的趋势，泉州在这前后开始崭露头角。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北方士民继续南迁泉州，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并且人口不断繁衍，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泉州的农业、手工业及海外贸易由此有长足的进步。从农业方面看，突出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水利的兴修。不仅山区进一步开辟，而且沿海开始大规模围垦土地，出现了许多围垦的“埭田”。《福建通志》卷五十六云：晋江“县境，凡港、浦、埭、塘，皆古人填海而成之，所谓闽在歧海中也”。惠安有三十埭，晋江有一百二十埭，其中以烟霞埭最大，

“广袤五六十里”。与此同时是水利的兴修。从唐贞元到太和四十二年间(785—827年),泉州先后开凿了几个大池塘,最著名的有贞元年间所筑的可溉田三百余顷的尚书塘,元和初(807年)的仆射塘和太和年间的天水淮等。此外,如泉州城东的东湖,是州境诸湖中最大的湖,唐时湖面达四十顷。有了这些湖塘淮,泉州平原的浇灌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耕地面积的扩大,水利的大量兴修,加上耕作技术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显著的进步。冶铁、制盐、制茶、铸钱、陶瓷、造船等都有较大发展。作为土贡的绵丝、蕉葛等纺织品颇有名气。开元寺本为黄守恭的一个大桑园,养蚕治丝,后来黄守恭把这座桑园赠送和尚建寺。陶瓷业亦较发达,现已发现这一时期的古窑址有几十处,其中以沿海的晋江、惠安居多。商业及海上贸易也发展起来。泉州港在唐代中后期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南方的重要港口。唐天宝年间(742—756年),曾任过朝廷起居舍人的进士包何写的《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云:“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全唐诗》卷二〇八)诗中“市井十州人”就是说泉州有来自各地的外侨,“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则说明在泉州登岸的还有外国使节,即各地商人云集泉州。至唐会昌年间(841—847年),诗人薛能的诗中有“船到城添外国人”句,说明泉州港确实是外国商人乐于往来的商埠。九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在《道程及郡国志》中把泉州与广州、交州、扬州并列为中国四大贸易港口。人口的增加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经济的发展。据《元和郡县志》载:泉州在开元时(713年起)户数为三万零七百五十四,到了元和(806年起)时为三万五千五百七十,已接近四万户的上州资格,所以被升为上州了。唐大中十一年(857年)登进士第的永春县人盛均

在《桃林场(今永春县)碑记》中说：“今己卯年(859年)，覲季父于此，视间里若巨邑，览风物如大邦，鳞鱗然廨宇之罗，霭霭然烟火之邦。……俗阜家泰，官清吏闲。凌晨而舟车竟来，度日而笙歌不散。”(冯登府《闽中金石志》)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时泉州社会经济已较为繁荣的状况。

五代时期，王审邽、王延彬父子治泉几十年间，为了维持统治，采取了一些保境息民政策，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是招怀离散，均赋编户，稳定社会秩序。王审邽招集流亡，以耕牛犁耙借给还乡的农民，并为他们修建庐舍。二是鼓励垦荒，兴修水利，采用中原带来的先进技术。大型水利如泉州陂塘、晋江六里陂、南安自家陂、九溪十八坝等的修筑，对发展生产与安定民生等起了重要的作用。三是发展商业，创建泉州子城，开拓航道，促进对外交通。因此，这期间泉州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旧五代史》说：“王氏起自陇亩，以至富贵，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通鉴》载：“初审知承制加泉州刺史延彬领平卢节度使，延彬治泉州七年，吏民安之。”《泉州府志·列传》云：“王延彬，审邽之子，……袭其父封于泉，官泉州刺史，在泉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船，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徐夤《贺清源太守》诗曰：“蕊珠宫里谪神仙，八载温陵万户闲。”所有这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泉州社会繁荣安定的概貌。

五代后期，留从效割据泉州，对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亦有一定贡献。后晋开运元年(944年)留氏被南唐封为“晋江王”，泉州升格为清源军。此后，留从效对泉州城进行一番大改造，先是主要从军事防御角度考虑而进行“重加版筑，旁植刺桐环绕”，随后则为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需要而进行扩城工程。《清源留氏族谱·鄂国公传》说：“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等数门。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间有土田不尽垦者，悉令耕种